

水浒评论集



复旦大学图书馆
赠阅请交换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目 录

论宋江对梁山起义军路线的“修正”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1)

宋江的投降主义和金圣叹的反动昏庸.....石望江(14)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两段评语

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魏永征(24)

《水浒》是部“官书”.....钟 亮(31)

不反天子，必受招安.....武 铤(34)

“断尾巴蜻蜓”是不真实的.....陆 佐(37)

“替天行道”——宋江投降主义的一面白旗

.....齐 军(41)

“替天行道”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

.....历史系学员 石源华 马骏民 韩明华(51)
.....上 海 工 具 厂 胡中生

儒侠·奴才·蛀虫

——读《流氓的变迁》.....陈允吉(59)

评《水浒》开宗明义第一章

.....新闻系工农兵学员 闻 军(64)

《水浒》接受教育.....中文系教授 刘大杰(68)

《水浒》与《金瓶梅》同论.....红 宣(73)

宋江与武训.....洪延青 杜恂诚(81)

宋江私放晁盖新析·····	中文系教授 郭绍虞(85)
内奸的自白·····	中文系 斯 浩(89)
宋江的“反诗”·····	仲富兰(94)
谈宋江死后“封侯”与“成神”·····	中文系 司 蕤(95)
宋江与“仁义之禽”·····	张 新(98)
奴才宋江的怒与喜·····	周 之(101)
宋江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 ·····	哲学系工农兵学员 哲 良(104)
宋江与“施忠”、“御猫”·····	凌 师(108)

哪一家的“教学书”？·····	延 风(111)
《水浒》——明清农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 ·····	胡奇光 赵克尧(119)
“风宪衙门”及其他·····	石 宕(128)
《水浒传》与《荡寇志》·····	魏永征(130)
金批本《水浒》与明末阶级斗争·····	龚祖魁(139)
《水浒》与“国防文学”·····	红 宣(149)

评《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李定生(156)
程朱理学的再现 ——评《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理 论基础·····	延 风(166)
阶级调和论是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	哲学系 翟 言(178)

评《水浒》研究中的唯心史观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185)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历史系教授 杨 宽(197)

驳斥《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

——评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的观点

.....历史系教授 杨 宽(204)

剖析宋江的所谓“矛盾性格”

——评《水浒》研究中的一种阶级调和论

.....洪延青(212)

农民没有这样的“局限性”

——评《水浒》研究中的一种错误观点

.....李 力(218)

反皇帝、反封建是中国农民革命的鲜明旗帜

.....上海工具厂青年工人 胡中生
历史系学员 韩明华(227)

农民革命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

体会.....延 风(234)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历史上农民军中投降派叛卖革命的严重

教训.....徐连达(240)

灵牌小议.....延 风(246)

《水浒》改名的启发.....徐 震(250)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工宣队员 汪祖根(254)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徐 震(257)

胡敲·巧棒·小索……历史系学员 刘 遐(261)

“解缚”与“束缚”……仲富兰(264)

不怕官司不怕天……周 之(267)

《水浒》三梦……延 凤(270)

“魔心”与“正果”……延 青(273)

论宋江对梁山起义军路线 的“修正”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

由于农民革命的叛徒宋江“修正”了以晁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代之以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归于失败。毫无疑问，反面教材《水浒》的作者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正确描绘晁盖的革命路线和梁山英雄的革命形象的。《水浒》的价值在于，它为了论证宋江的投降主义的合理性，无意中将宋江修正主义阴谋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总起来讲，宋江对梁山起义军革命路线的“修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步，混入革命阵营，骗取一部分人的信任，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第二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使投降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在梁山占据统治地位；第三步，以这条在梁山泊已经合法化的叛卖路线，将梁山农民起义军引入了“全伙受招安”的彻底覆亡的结局。

—

对于一切投机家来说，混进革命阵营总是实现叛卖目的起点。宋江是怎样和为什么上梁山的呢？此人本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卫道士，熟谙地主的“吏道”，恪守封建专

政的“法度”。他的逻辑是造反无理，所有起来造封建统治阶级反的人统统都是“犯了迷天大罪”。他的“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的自白，半是对欲做奴才而不得的愤懑，半是对高俅之类“饱狗”的妒嫉。杀死阎婆惜案发后，宋江被迫逃离。尽管晁盖等人再三请他参加起义军，但这种“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情对宋江是比死还可怕的。他甘心情愿接受封建国家“法度”的惩治，发配江州。后又被判“律斩”。这时，宋江开始懊悔“当初不听晁盖之言”上梁山去。但是，这丝毫不表明宋江变得比以前革命了，而是因为昔日的刀笔吏成了今日的阶下囚，昔日的地主刑典的执法者成了今日的伏法者。从昔日在县衙门里博得“上下爱敬”到今日猪狗不如地“在屎坑里滚”，这种急转直下的地位变化在心理上不是一下子能够适应的，宋江只不过“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罢了。他把晁盖、吴用等劝他造反仍然看作“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一会儿“泪雨如下，便拜倒在地”，一会儿“自把头去壁上碰撞”，一会儿“把刀望喉下自刎”，真是丑态百出。说来说去还是老调子：不肯造反。因此，宋江虽然几上梁山，但他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转瞬间就溜烟，头也不回地逃下山去了。

然而宋江最后毕竟是上山了。他追求荣华富贵的愿望与混进梁山队伍的行为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这是因为宋江梦见了九天玄女娘娘，他不仅喝了香酒，吃了仙枣，得了“天书”，还受到了神的启示：“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在这场滑稽戏中，宋江碰到了一个为君权服务的神权。从此，宋江省悟

到在封建秩序被农民革命搅乱，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倾轧加剧的情况下，要想象在“升平日子”里那样循着功名取仕的封建正统道路挤进高级统治者的行列，是不可能了。从杀惜出逃到发配江州几乎上断头台的那一段生活，给他前半生的历史作了总结，迫使他重新寻找“它日身荣”、“衣锦还乡”的捷径。这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野心家不难懂得，如果自己能用九天玄女娘娘的那四句话来“修正”梁山起义军的政治路线，“擗掇”一支农民起义军投降，就是一份向反动派求得报偿的见面礼。

宋江坐上了梁山泊第二把交椅，但领导权基本上还是掌握在晁盖手里，梁山起义军还是遵循着晁盖制定的正确路线发展和壮大着。这无疑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障碍。但他丝毫没有放松自己的投降主义活动。要搞阴谋，就要有支持自己的人。他开始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宋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各个部门里培植和安插爪牙，从败军降将和地主豪绅转变而来的梁山头领中寻求对自己投降主义路线的支持。他在狂热地探求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在西岳华山，他背着晁盖，擅自截取宿太尉，并对他说：“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这番话既向封建统治者表白自己与梁山起义军不是一路人，又在朝廷里为自己挂上了号，为将来的叛变投降、领取高官厚禄埋下了伏线。由于宋江的两面派活动不易被识别，又由于他已经在水泊梁山内培植了一个足以篡夺领导权的班子，因而晁盖一死，他便立即掌握了梁山起义军的最高权力，当上了寨主。领导权和路线是相互制约的。领袖不好，他就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正确路线。宋江现在

更加放手地从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了。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第一个阶段。

二

晁盖尸骨未寒，乌云就笼罩了水泊梁山的上空。宋江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阴谋得逞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梁山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就是忠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宋江的“忠义”，同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纲领一样，其实质都是只准对封建政权修修补补，不准搞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的社会革命。这是古今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把“忠”字牌额公然高悬在梁山起义军的议事厅上，就意味着强迫革命农民接受反动的皇权主义，把农民起义纳入到替地主阶级修补国家机器，重整封建朝纲的轨道上去。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标志着宋江对晁盖路线的“修正”已经公开化，也标志着宋江带领的梁山农民起义军开始蜕化变质，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重大变化，是在拥护晁盖的旗号下发生的。祭奠晁盖的香火未断，“梁山泊主天王晁盖公神主”的灵位赫然，可是晁盖路线已被篡改了，晁盖举起的旗帜被踩在地下。这种情况就象列宁描绘过的那样，当伟大的革命家逝世的时候，反动阶级“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富于造反精神的梁山好汉竟然如此轻易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十足的地主阶级分子去支配，这真是莫大的悲

剧。宋江的反革命阴谋得逞了。他把夺得梁山领导权看作是孔孟之道的胜利。同“不读书史”的晁盖相反，宋江是个由封建正统教育培养起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之徒。他很懂得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妙用，一钻进农民起义队伍，就着手用孔孟之道来改铸革命。他不是理论家，但是却有无穷的精力横一遍竖一遍，不厌其烦地推销儒家的空洞说教。他左一个忠，右一个孝，甚至燕青在秋林渡射雁，也要引起他酸溜溜地发一通“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具备”的怪论。他一只脚踏进棺材，还没有忘记声明：“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儒家的忠道已渗透他的灵魂，“尽忠报国”，皇上“至圣至明”、“皇天垂佑”、“安敢叛逆圣朝”之类的烂教条已在他脑袋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难以消除的垃圾，以至他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对每个偶然遇到的人重复这种单调的奴才梦呓。

宋江就是致力于用这种奴才的形象改造梁山起义队伍的。从“聚义”到“忠义”，一字之改，体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这是起义军从革命向投降的转化。农民的“义”的概念，物质材料是来源于自己的革命实践，思想素材是基于对儒家的“义”的批判。“义”本来是统治封建社会的思想，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是反动地主政权模糊阶级对立、镇压人民反抗，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巩固本阶级专政的思想支柱。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德国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曾在宗教改革的外衣下进行一样，也正如我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家们曾经利用宗教形式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样，梁山农

民起义军在扫荡旧世界的斗争中，对“义”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使它成了召唤农民革命英雄加入自己行列的口号。更准确些说，革命农民的阶级斗争实践赋予了他们观念中的“义”以新的解释、新的内容。对他们说来，“聚义”，就是要把千百万苦难的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感奋起来，就是要造反、要革命，就是意味着要打倒地主老财们的“不义”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欺凌、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断金亭上，招多少断金之人；聚义厅前，开几番聚义之会”，夺生辰纲前的“七星聚义”，晁盖上梁山后的“十一人重聚义”，以及阮小五对梁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的生活的赞叹，都反映了贫苦农民对“不义”的地主统治的痛恨及对消灭了“不义”的美好社会的憧憬。这种粗糙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虽然在当时和以后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是却深刻地表述了农民的革命情绪和团结要求，是对非正义的黑暗封建社会的直接的、坚决的否定。

在农民朴素的头脑中，“不义”与“聚义”，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当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将盘剥来的民脂民膏送去东京给他岳父蔡京作生辰纲时，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兄弟都异口同声地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他们从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是“不义”的行为。要打倒这个“不义”，就要“聚义”，奋起斗争，诉诸武器的批判。劫取生辰纲，为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大规模活动拉开了有声有色、彪炳灿烂的一个序幕，鲜明地显示了梁山革命者的历史主动性和起义的反封建性质。晁盖等人上山后，王伦“妒贤嫉能”，搞关

门主义，竟要打发晁盖等到别处去“歇马”。林冲愤怒地杀掉了这个“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落第穷儒”，高喊“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晁盖）为山寨之主”。这是富于正义感的林冲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重大贡献。晁盖提出的“各人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革命口号，开拓了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聚义”，不仅是要同地主阶级作斗争，而且是要同革命队伍中一切破坏团结、损害农民群众革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如果梁山农民起义军能够始终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就会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或许宋王朝这座阴森森的封建城堡就会被农民革命的洪流冲垮，或许宋江也会被作为叛徒而受到农民的审判。

可惜“聚义”的客观阶级内容，并不能代替梁山革命者本身的主观认识。梁山起义军的基本队伍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小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使他们的眼界受到限制，提不出也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的“义”的内容是不科学、不彻底的。它不是一个明确的阶级概念，并没有完全与儒家的“义”划清界限。实际上，《水浒》中表现的这种农民的“义”，也是一个被作者歪曲了的观念，它完全没有触及封建社会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它与北宋年代在现实舞台上活动的起义农民的“等贵贱”、“均贫富”等政治口号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尽管“聚义”与“忠义”表现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但梁山起义者自己不可能认识到这种对立，不可能对宋江的“义”进行阶级分析。这种缺乏阶级分析的模糊认识，正好被宋江利用

来售其奸。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不仅没有遭到梁山好汉们的反对，反而“尽皆欢喜，拱听约束”，这绝不是偶然的。

宋江一上台，就可以很容易地对农民的“义”进行再改造，把农民的进行阶级斗争的“义”，改造成了搞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义”。“忠义”的本质就更清楚了。宋江的“忠义”，对于官军，是投降下跪的理论根据，对于梁山泊中人，则是一种骗人的策略，一种推行投降主义政治路线的奴隶式的纪律。对于他，虚伪的“义”是为“忠”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忠义”是不可割裂的整体。他自己说“忠心扶社稷，义气助家邦”，“我等忠义自守，以两取一，非所愿也”。他仿佛下决心要让对统治者的忠诚占领百分之百的空间和时间，甚至梁山起义军的军粮都要标上“水浒忠义粮”这种不伦不类的字样。他对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杀气腾腾，对前来镇压起义的败军降将则温情脉脉。他见了降将彭玘，赶紧哼起“误犯虎威，敢乞恕罪”；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还指责梁山起义军对凌“如此恁地无礼”；见了徐宁，他连声赔不是；见了呼延灼，他浑身发抖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见了关胜，他来个欠身施礼道：“郓城小吏宋江谨参，一惟将军问罪”；见了索超，立刻声明“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见了董平，他“慌忙下马，纳头便拜”；见了张清，他连声喝退了“尽要来杀张清”的梁山头领，恐吓说：“众兄弟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宋江的“忠义”所表现出的这种鲜明的阶级性，使那些朝廷命官欣喜若狂。如呼延灼，看到宋江同自己“义气相投”，立即宣布“实感兄长义气过人”，“愿

随鞭撻，……决无还理”——就是说，跟着这样的投降派跟准了，跟定了。张清也是这样，“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他们就这样不仅没受到起义农民的惩罚，反而一个个安然无恙地混进了梁山。梁山之巅耸立的“忠义”黑旗，成了地主官僚反动派逃避人民惩罚的避雷针。

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宋江的“义”同农民的“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起义的农民看到宋江的“义”给自己带来损害，怀疑产生了，加剧了。李俊、张横捉到官军将领刘梦龙、牛邦喜后，料想若解上山寨，必定要被宋江以“义气”为名放走，两个好汉商量，当机立断，把这两人在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这是革命农民从自己的阶级本能和现实的逻辑出发，对宋江的“忠义”的一次消极的反抗。但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晚。领导权被投降派篡夺，路线被改变，思想变了质，离悲剧的结局就不远了。

三

梁山起义军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迅速地向深渊滑去。从表面上看，在梁山一百零八将排座次后，梁山起义军在军事上还取得了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胜利，然而由于这些战斗都不是为了推翻统治者，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而是为了争得一个投降的好价钱，因此作者把这些胜利写得越是轰轰烈烈，越是使人感到隐藏在这种胜利背后的悲剧气氛。接受招安的政治路线在菊花会上强行通过，标志着这支农民军队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封建统治者对梁山起义军的反革命两手，是梁山起义军“全伙受招安”的外因，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则是内因。封建

统治者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欺骗，加强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位。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宋江为接受招安所作的一系列表演，是投降主义路线最完整的图解。他首先带着大家歃血为盟：“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如果谁违背了这条投降主义路线，那就要来个“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紧接着，宋江又在菊花会上用突然袭击的方法，第一次公开地亮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政治纲领。他迫不及待地亲赴东京，企图通过宋徽宗的爱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来求得招安。当陈太尉第一次带着诏令来梁山泊招安时，宋江又险恶地向他献策，请求封建统治者了解“我梁山泊的弯曲”，在诏书里加些“抚恤”的甜言美语来欺骗梁山起义军。正是在宋江与封建统治者的内外勾结下，接受招安变成了事实。

梁山起义军“全伙受招安”意味着什么呢？对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地主阶级来说，招安意味着终于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斗争烈火扑灭了。对由晁盖缔造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说来，招安意味着彻底的覆灭。从受招安之日起，这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树了历史功勋，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爱戴的农民军，转化成了一支被地主阶级收编的杂牌军。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农民英雄，变成了一伙身着御赐红绿锦袍，足蹬粉底朝靴的官场人物。

对宋江说来，受招安就是所谓“成正果”，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终于爬进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内层，参加他们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了。“宋徽宗亲御宝座陪宴